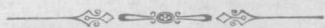


儒法文艺思想斗争概况

法家文论选

一九七五·三

儒法文艺思想斗争概况



法 家 文 论 选

儒法文艺思想研究组

一九七五·辽宁

前 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场斗争的逐步深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深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并遵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总结和吸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我们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从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反修防修，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尖锐激烈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影响

到现在。儒法两家都有各自的文艺主张，用来为各自的政治路线服务。可是，长期以来，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历史却被历代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严重地歪曲了，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大搞复辟倒退，极力吹捧反动的儒家文艺，胡说什么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还有的人吹捧儒家文艺思想“奠定了文学批评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抹杀法家在文艺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诬蔑法家否定文艺、排斥文艺，没有什么文艺思想可言等等。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文艺领域儒法斗争的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弄清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表现和斗争实质，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肯定，并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总结历史经验，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进一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根源，提高我们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配合当前我省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和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需要，我们组织了有工人、宣传文化干部和大专院校教师及工农兵学员参加的“三结合”编写组，初步地研究了儒法代表人物的文艺观点及其影响，以法

家进步的文艺思想为线索，涉及历史上广泛的反孔文艺思想斗争，编写了《儒法文艺思想斗争概况》、《法家文论选》（征求意见稿）。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学得不好，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历史资料分析不够，编写又十分仓促，其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儒法文艺思想斗争概况

(征求意见稿)

《儒法文艺思想斗争概况》编写小组

一九七五·辽宁

目 录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5
两汉时期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38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59
唐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85
宋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108
明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130
清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149
近代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168
结语	188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

儒法文艺思想斗争

一、政治、经济与文艺概况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

中国奴隶制社会，约自夏代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到春秋时期，奴隶社会走向没落与反动。

奴隶制社会，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奴隶主贵族占有社会的全部财富，完全剥夺了奴隶的人身自由的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发展到春秋时期，奴隶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掌握了冶铁技术，创造了铁制工具并使用耕牛，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已经落后了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奴隶主的残暴统治，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奴隶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春秋末年，柳下跖领导的奴隶大起义，“从卒九千”，“名声若日月”，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沉重的打击。阶级斗争促进了旧制度的灭亡，显示了奴隶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

在奴隶及其他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也在变化。春秋中叶，开始出现了土地私有制，这是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使新兴地主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礼崩乐坏”，朝不保夕，陷于总崩

溃的境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封建制的经济和政治已经逐步形成，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秦、楚、齐、韩、赵、魏、燕七个主要国家内部，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秦国封建制发展较快。总的说来，各国奴隶主残余势力，都还有比较强大的力量，有的还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二百多年的激烈斗争，最后由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新兴地主阶级终于夺得了斗争的胜利，奴隶主阶级归于失败。

战国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就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各个阶级都有一批为本阶级制造舆论的思想家，但是归根结底，不外乎两大家，一是赞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一是反对封建制，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前者以法家为代表，后者以儒家为代表。儒法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

当时儒法两家斗争的焦点，在政治上表现为实行“法治”还是实行“礼治”；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还是维持或复辟奴隶主贵族统治与分封割据。在经济上表现为发展和巩固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维护奴隶主贵族占有全部土地的“井田制”，继续束缚社会生产力。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要求革新，“法后王”，主张“人定胜天”，还是要求复古，“法先王”，主张“尊天命”。

法家的先驱少正卯，与孔丘是同时代人。具体生卒年月，已

不可考。《荀子·宥坐》篇是记录少正卯活动的最早的文献。根据这篇记载，少正卯是“鲁之闻人”，他的革新学说，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孔丘对他恨入骨髓，所以一旦掌权，就杀害了少正卯。孔丘给少正卯加了五条二十个字的“罪名”，即：“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意思是少正卯要求通过颠覆手段掌握政权；少正卯主张法治，而且坚定果敢；少正卯的言论反映了“思乱之民”的要求，具有批判的锋利性；少正卯的著作，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并且有大量具体例证；少正卯支持和赞同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言论并给予丰富润色。少正卯与孔丘的斗争，反映了儒法斗争的尖锐激烈与不可调和。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代，文学艺术有了很大发展。我国远古时代流传下来许多神话，大都是口耳相传，不见于文字。到先秦时期，开始有所记载，两汉以后，记载更多。这些神话，许多都是反映远古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如“精卫填海”，记述“神农氏”的少女，溺死于东海，变成一种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填塞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诗经》的内容相当复杂，有反映奴隶主贵族生活的；也有不少反映奴隶们的劳苦生活和思想情绪的，这一部分大都出于《国风》，即各诸侯国的民歌。象《魏风》中的《伐檀》，愤怒嘲骂奴隶主贵族不劳而食；《硕鼠》，把奴隶主贵族比作害人的大老鼠，并且热烈希望“适彼乐土”，逃到不受剥削的地方；又如《豳风·七月》，生动地叙述了周代农奴终年辛勤劳动，但是劳动果实全被夺走，自己一家饥寒交迫，与奴隶主贵族游手好闲，羊羔美酒的寄生虫生

活，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

战国后期，楚国的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大诗人。屈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在哲学思想上，对传统的“天命观”表示怀疑和否定。他受到代表奴隶主贵族势力的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人的排挤和迫害，用诗歌抒发自己的怀抱，写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诗篇。在《离骚》中，他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意思是说，由于反动势力结党营私，苟且偷安，致使国家前途危机四伏；他感到人生道路十分艰难，但他深信变法图强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信心坚定，至死不悔。又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意思是说，一些反动势力背弃法治，倒行逆施，苟合取容，离开正道，他对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屈原在《九歌·国殇》中，对抗敌阵亡的将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赞美他们“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些都表现了屈原的进步思想。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表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出现了许多政论、寓言和韵文。诸子百家当中，法家荀况、韩非和秦代的李斯等人，都善于用简炼的语言，宣传法治路线，批判孔孟之道，他们都长于进行生动的论证和辩驳，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较高的成就。

二、孔丘、孟轲的反动文艺观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春秋末期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奴隶主贵族，后来逃亡到鲁国。孔丘年青时，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吏。曾经一度爬到鲁国司寇的地位，上台不久，就杀害了鲁国的著名法家先驱少正卯。后来，他招收一批弟子，周游列国，积极推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路线，由于他逆时代潮流而动，所以到处碰壁。晚年，他着手整理奴隶制时代的某些历史文献，还编写了一本奴隶主贵族的变天账《春秋》。

孔丘是一个反革命复辟狂。在政治上，他拚命推行以“克己复礼”为纲领的反动政治路线，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顽固地维护陷于崩溃的奴隶制，极端仇恨奴隶们和平民起来造反。在哲学上，孔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鼓吹“唯天为大”的天命观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孔丘的一生，是为奴隶主贵族奔走呼号，终于彻底失败的反动一生。

孟轲（约公元前371—前289年），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是孔丘的孙子子思（孔伋）的弟子，是孔丘反动学说的继承人。子思——孟轲，被称为“思孟学派”，是儒家学派的所谓“正统”。孟轲比孔丘晚生将近二百年，这时奴隶制已经崩溃，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尚未完全巩固，奴隶主贵族还没有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不断进行复辟活动。孟轲就是这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言人。孟轲继承孔丘“克己复礼”的衣钵，鼓吹所谓“仁政”，要求恢复“井田制”，反对法治路线，反对法家奖励耕战的方针，大力鼓吹“天命”、“性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的下场大致和孔丘相同，都以到处碰壁，彻底失败而告终。正如毛主席所深刻论证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孔丘、孟轲有一套反动的文艺观，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吹“事父事君”、“约之以礼”，推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文艺路线

孔丘生于奴隶制全面崩溃的历史时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为了推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便在文艺上大力推行“事父事君”、“约之以礼”的反动文艺路线，为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

下面两段话，可以说是孔丘反动文艺观的纲领：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又见《论语·颜渊》

孔丘所谓“事父”、“事君”，就是要求文艺要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效劳，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忠孝”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这就暴露了孔丘鼓吹学《诗》的反动政治目的。

孔丘认为这种用以“事父事君”的反动文艺，应该具有“兴”、“观”、“群”、“怨”这四种功用。在天下大乱、

“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奴隶主贵族统治势力正在逐步走向衰亡，这个反动阶级已经浸透了悲观绝望的情绪。孔丘鼓吹“兴”，用以激发没落奴隶主贵族进行垂死挣扎的积极性；鼓吹“观”，要求奴隶主贵族睁开眼睛观察研究一下严重的形势；鼓吹“群”，要求奴隶主贵族阶级紧紧抱成团，不要再互相倾轧、自相残杀；鼓吹“怨”，要求文艺对正在灭亡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可以“小骂大捧”，纠正不利于复辟活动的言行，但是却不准表现出对奴隶主贵族的憎恨和对抗。

孔丘还提到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附带的，然而又是不可少的。对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奴隶主贵族，孔丘要他们多少知道一点社会生活常识，以增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维护奴隶主专政的能力。

但是，仅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毕竟是不够的，孔丘认为，一个“君子”——奴隶主贵族统治者，还要“博学于文”，所谓“文”，泛指古代文献，如《诗》、《书》、《礼》、《易》之类。但当时，奴隶主贵族面临着强大的奴隶革命风暴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蓬勃兴起，奴隶主阶级也在急剧分化。有一些人转向新兴地主阶级一边，这在孔丘看来就是“畔”，即叛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危机，所以提出“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君子”的思想言行，使他们“弗畔”，即不进行非“礼”活动。

尽管孔丘煞费苦心，制定了种种方案，可是那些冥顽不灵的奴隶主贵族并不按照孔丘的希望去干，他们虽然学了《诗》，可是没什么用处，既不能用之于内政，也不能用之于外交，反而弄得内外交困，节节败退，这使孔丘大为愤慨，所以他牢骚满腹地

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哉？”（《论语·子路》）纵然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丘认为他们诵诗，用的不好，关键在于这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即“诗”、“乐”与“仁”、“礼”的关系认识不清，所以他声嘶力竭地多次提出，要摆正文艺（诗、乐）与政治（仁、礼）的关系：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

——《礼记·仲尼燕居》

孔丘三句话不离“礼”，目的在于把诗、乐乃至更为广泛的“文”与“艺”，都纳入“礼”的轨道，使一切文化、文艺，都紧紧地为“礼治”路线服务。在他看来，这不但与“君子”的立身成名有密切关系，而且对“治国安邦”，也有极大的影响：

“子张问政，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礼记·仲尼燕居》）意思是说，“君子”不但口头上要谈礼，行动上也要守礼；这样做起来，奴隶主阶级都很高兴，这就是“乐”。“君子”努力搞好礼、乐这两件事，就可以面向南接受朝拜，奴隶主贵族统治于是乎巩固，“天下”于是乎“太平”，再没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孔丘妄想用“礼、乐”去挽回奴隶制崩溃的形势，当然只能